

现代时间观念的形成与新闻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

周 彤, 芮必峰

摘 要: 时间是人类意义世界构成的基石, 现代性始于现代时间观念。文章从现代时间概念出发, 尝试对“现代意义的新闻”在中国的发生与现代性在中国的源起两个问题做一个关联研究。分析发现, 新闻作为现代文化的一种形式深度参与了现代性的起源, 它通过强化国人现代时间观念, 建构“求新”、“求变”的媒介图景, 部分执行了“经典淡出”之后意义世界的补位工作, 促进了国人心性结构的变化——“走进现代”。在此意义上, “新闻”可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可靠参照。

关键词: 现代性; 现代时间; 新闻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7)02-0120-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7.02.013

一、引 言

甲午至戊戌, 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号角中掀起第一次办报高潮, 创办报刊、言论救国、阅读报刊、关心时事成为晚清士人的普通实践。卞冬磊通过阅读史的考察关注到 1894 年到 1895 年春夏, 读书人日记中频繁出现“沪上新闻纸”的身影^{[1](P8)}。由报刊所编织的“时事之网”通过各种社会通讯的传达, 谈论正在进行的战争与国家的变革成为许多读书人阅读生活的新体验。这种新体验所体现出的“共同世界之现在意义”与前现代社会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感受相比, 初具现代意义的倾向。

在当下社会, 我们早已感受到新闻现代性效果的“威力”, 新闻所建构起的媒介图景深深影响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倘若我们把时间倒回一百多年前——国人办报勃兴之时, 进而追问新闻与中国社会“接触”之后的现代性发生机制问题, 应该是一场别有意义的“旅程”。

有学者指出, “现代意义上新闻的成熟恰恰是对现代性的最佳注解”^{[2](P66-68)}。如此论断具有结论性质, 但鲜见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意义脉络。本文基于这一问题意识, 试图从现代性重要原则的时间观念角度出发, 以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和晚清士人关于新闻阅读的经验为参照, 对此展开分析。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到了一个命题: 新闻是历史性的现实, 它是一种由特定的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发明的文化形式……新闻形成并反映了一种特有的“对经验的渴望”; 一种废弃史诗、英雄与传统, 偏爱独特、原创、新奇和新闻——即“新闻”的愿

基金项目: 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点资助项目“报刊舆论与中国现代性研究”(ADYQXC201615);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学术与政治: 民国时期新闻团体的职业教育研究”(AHSKQ2015D107)

作者简介: 周彤, 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 230000); 芮必峰,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院长,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望^{[3](P10)}。史诗、英雄与传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典”,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经典”超越时空,凝结的是人类智慧与经验,往往越是长久存在,它越能代表着普遍的、恒常的规律。废弃它们,意味着与“普遍”、“恒常”诀别,追求“新闻”代表着对“变动”的关注。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从其诞生之初起,就意味着其与经验世界的“偶然”、“独特”、“新奇”相关,沿着凯瑞的理路诠释的新闻观颇具新意。

一、“关注现在”与“导向未来”:现代时间观念的内涵

16世纪以来,欧洲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工业革命、交通革命、政治革命,物质器物的新发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思想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西方成就及其发展均对之后的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支配力量:西方社会为全球社会制造了标准化的样本,使我们无法逃离机器的工业生产,无法逃离科层组织官僚体系对我们的管理,无法逃离西方文化对我们的统治……一个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代”就此诞生。社会学理论认为,现代社会转型是一场总体的转变,它既包含了物质器物层面的进步、社会结构制度层面的转变,也包含了人的精神状态和意识的蜕变。

对置身于奠基在主体哲学之上的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生活个体而言,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生活诸方面均发生了不同程度质的转变,从历史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之后西方社会遭遇到的系列新体验。如果我们要追问新的体验究竟是什么?可能没有人能准确地用一两句话概括出来。

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里——“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P254)}。现代性寓意着对现状的否定与超越,人类社会步入快车道,与经济基础变动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在不断变化中。在波德莱尔美学的表达里,“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5](P485)}。现代性更是一种一闪而过的状态。两个文本不约而同地将现代性置身于高速度、瞬间即逝、快速变动的的时间框架中,其中充溢着人对于现代性时间的体验。所谓现代时间,就是现代性给人带来的时间观,在康德看来,时间本身不能被人知觉到,它不是客观之物,非现象实体,而是人类主观之条件,是人类的内直观形式,时间只有与经验的实在性结合才能显示出时间的先验观念性意义。在人类社会从古代进入现代过程中,一切秩序与社会规范被重新界定,理性把人类从神学的蒙昧中解放出来,科学赋予人们理性知识。从地理大发现到科技的高速发展,从文艺复兴人性的解放到启蒙运动后对理性的推崇,人类从此告别中世纪的禁锢,进入主体性高扬,人类自己管理自己的“新”时代。这一切新的变化,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现代时间的生命体验与传统时间的不同。

时间与空间是人生实践和自我发展的具体情境,也是人类社会意义世界构成的基石。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6](P532)}。在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未来”中,主体能够真切感受的惟有“现在”,从现代性原初涵义——“成为现代”、“此刻、现在”和“现在存在的事物或此时此刻”^{[7](P63-65)}出发,我们可以概括出现代时间观是遗忘“过去”,关注与体验当下,却又否定“现在”,并把目光瞄准无止境的“未来”,它是高速度的矢量直线时间观。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里提出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其中“时空分离”是重要的方面,他认为前现代社会人们的时空观念和特定的时空坐标联系在一起,而现代社会,由于媒介和交通工

具的发达,“现代”不仅扩大了人们存在的时空范围,而且容易形成“不在场”的“在场”状态^①。这是对现代时间观念之于人实践作用机制的重要解读。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现代性话题与时间难以分割,现代性始于现代时间意识。当人们认识到自己与古代、过去不同,并能想象未来,把精力与关注点集中在现在,那么由此迸发出的创造力会是无穷的,黑格尔哲学中对于现代与当下的解释也侧重于此:“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8](P8)}。

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时间观念起源于启蒙运动,“启蒙”的本义是“自我反思”,这是一个指向自身的概念,在现代时间—历史框架下,西方的启蒙逻辑顺序是以个体的解放带动社会整体的解放,即以个体理性的觉醒完成整个社会的“祛魅”。而就中国而言,这种顺序颠倒了:由寻求社会的救亡图存、“保种保教”到个体独立解放意识的觉醒,这与当时中国面临深刻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相关。由此,我们对于国人的现代时间意识何时萌发,现代时间意识又给整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气质和国民的心性结构带来怎样改变问题的探讨需要有中国意识,要回到晚清之际“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具体时空中来考察。

二、“时间”的转变与意义世界的转向

从古代时间进入现代时间,感官体验的变化最为直接,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两位晚清人物在初次“触电”现代时的心态与表现:

时值1848年,在中国近代新闻史和思想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王韬(20岁)从苏州出发到上海探望设馆授徒的父亲,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古典世界”中。1840年代一些重要的事件——鸦片战争、《南京条约》、沿海开埠,没有打扰内地中国读书人的日常生活。第一次的上海之行,王韬在其《漫游随录》中记载了初次接触“现代”的场景:

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阁楼峥嵘,缥缈云外……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入其室中,缥缈插架,满目琳琅。麦君有二女……皆出相见。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瑾醇醪也。又为鼓琴一曲,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曰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后导观印书,车床以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9](P28-29)}。

46年之后(1894年4月29日),参加会试的皮锡瑞一行人返乡途径上海,参观上海纺织机器局、造纸局和自来水局,面对这些“现代物件”,他以惯常的“格物致知”之法加以审视,在其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机器纺棉花极快,声隆隆如殷雷,热不可当。即其用人力者,每处以一妇女司之,亦与村妇所为劳逸大殊。自来水用吸力取黄浦江水,分注各地,澄清再分往各处。或云其水清,久在铁管中,性寒,不宜人也。纸以各式旧布为之,变为洁白,然其本质殊不堪问,恐不尽清洁也^{[10](P440)}。

面对新奇的现代器物,王韬发出“诚巧而捷也”的感叹,皮锡瑞则从“理”与“道”的层面对

^① “不在场”的“在场”状态是笔者的一個总结,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时间逐渐地与确定的生活地点和具体的社会行动脱离,具有超越时空的时间虚设。如机械钟表的出现,使时间虚拟化;世界地图的出现,使空间虚拟化。时空观念已经打破传统的局限,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借由媒介工具的使用,使人们在不同时空中能对共同的“媒介事件”做出反映形成一种“在场”状态。当然,吉登斯的思想是对发达现代社会现代性动力机制的思考,与本文所述的“现代”时间相隔甚远,但他的思想对于理解“现代时间”概念是大有裨益的。

自来水得出“性寒，不宜人也”的论断，两人的观感和认识应该可以代表当时读书人初次接触西方“奇技淫器”时普遍的心态。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初次接触“现代”时，他们是以怎样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方式来认识“现代器物”的？在这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意义世界？

古代时间与之对应的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时间观中，过去、现在与将来不存在明显的区分，文明和历史只不过是一种循环，人们的时间意识与“在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社会实践在循环往复中遵循着时间的规律，一旦面临变动，人们愿意在传统中寻找先例。由此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晚清面临巨变之时，士大夫首先想到的是在“中学”中寻找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导。

晚清之际，虽然西方现代文明纷至沓来，条约口岸的日常生活和内地已有很大区别，西方器物也经由商贸进入内地，但读书人思想世界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经史子集包罗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普遍知识，中国读书人在这个知识世界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完满的意义世界，在泛道德的逻辑演绎下，对事物的体察与终极真理相联系，这就不难理解皮锡瑞在第一次见到自来水时所做的“附会”式的联想——由“水”延伸到“质”，进而上升到“道”的层面。

我们可以认识到纲常伦理、经典之学所包蕴的意义世界是古代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来源，规范的惯性力量长久支配着社会的运转逻辑，社会在其中发展缓慢，这种“规范”如同史诗般存在。在中国人的视域里，它们是超越时间的存在，是被反复证明的恒常法则。在这样的社会中，对“道”及“道”的逻辑既没有反思的可能也没有反思的必要，但随着外力的冲击，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之变，这个根基松动了。甲午战败让中国读书人真正感受到民族危机的紧迫感，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唤起屋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从而，彻底的改革成了上下的“共识”，社会的激进情绪在战败的阴影中弥漫，对于自觉肩负家国使命的知识阶层来说，再也无法沉浸于耕读的悠游岁月与经史子集的意义世界中了，关注现实、寻求新知、救亡图存霎时间成为时代主题。而此时，严复译介的《天演论》所引入的现代性进化（进步）时间—历史框架，对中国现代性思想的萌生可为功莫大焉。

从西方进化论受到启发，严复批判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两种历史观：“信而好古”的历史退化论和“治乱往复”的历史循环观。他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1](P1)}在他看来，历史发展是前进式的，遵从“天演”的规律，“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斯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也”^{[12](P135)}。按照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图式，社会发展是渐次演进的过程，具有“向前看”的动力机制，这与当时国人普遍抱有的历史观大大不同。进化论击破了国人对“古代时间”的依恋，完成了意识形态时空观念的现时转向，它与现代时间观念的结合，标志着中国人拥有了线性矢量时间的概念。

现代时间观念的形成为现代性提供了认知自身与发展的可能，历史发展的目的论在当中变得突出，时间不再是机械的循环，生命与事件都在高速地奔向未来。与此相应的是，现代时间中的社会实践是进化性质的，人们无法在历史经验中找到答案，皓首穷经于古典知识中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严译《天演论》带入的进化论成为当时社会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确立的标志。诚如尤西林的评价：“由严译《天演论》始，进化主义与近现代思潮的保守主义、渐进改革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发生了联系，进化观成为各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共同的前提和深层结构，它所奠定的现代时间—历史框架一直保持下来，成为寻求民族国家自立自强的现代性初始条件和最本元的心性结构”^{[12](P29)}。

三、中国新闻现代性的发生——从新闻纸形式与内容层面说起

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来华和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来华是中国历史上两次重要的中西文化碰撞与对

话,这种交流将东方与西方最具代表性的知识阶层推向历史的前台: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两种文明的沟通对出版物的依赖,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13](P2)}。而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新教教士的传教手段除了延续前辈化“教”为“学”,采用书籍传教的方法外,更依赖于当时在西方世界滥觞的现代新闻纸,这使得西学传播的力度更大。

中国近代中文报刊史的书写始于传教士报刊。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欧洲为中心发展出来的各式新式传播工具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这些新式传播工具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更重构了当地人的时空想象。从传教士报刊开始,报纸就将旧历与西历对应起来,在习以为常的中国时间之外,引入了西方时间。有论者指出,《万国公报》的封面凝结了一种新的时间空间世界,可以被看作是时间空间的一种新的象征,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进步的西方世界^{[14](P121)}。花之安在《新闻纸论》这篇新闻专文中曾对西方新闻纸按时间出版的形式有这样的介绍:“其出也定期,或一日三次,一日二次,一日一次,或半月、每月一卷,或半年、每年一卷,或每季、每礼拜一卷,其数甚繁。大抵每日出者,则为时势、政事、杂报居多。每月、每礼拜出者,则为专报,如天文、格致等报居多。盖事有多寡,且有难易,故不得不分报也”^{[15](P9)}。出版时间的不同意味着人们在阅报时必然要重视对信息与知识时效性的考量,时间越短代表着它们进入阅报者意义世界的时间序列也越是紧凑,愈加接近“现在时间”。

在古代时间中,即时的社会信息的传达除小范围传播的邸报外,主要依靠社会的“流言网络”,流言、贩夫走卒之语、私人书信、邸报与京城传来的小报构成了帝国最原始的传播网络。现代新闻的传播基于现代物质手段,与“马传邮驿”相比,电报、火车等现代器物运用在新闻的传布上,给人造成感官上的“现代效果”是最直接、最震撼的。这种直觉的变化,我们从当时报人对新闻流布速度的惊叹赞美中可见一斑:“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文甫脱稿,电已飞驰”^{[16](P19)}。“泰西报馆之设……迄今数十年,风气日开,功效日著,制一精器,登报以速流传而工作兴矣……与国之政令,朝夕可通……至于探一新地,行一新政,见一新理,得一新闻,皆可与天下之人,同参共证”^{[17](P10-11)}。

有论者在研究近代书刊出版时指出,技术上期刊定期的发行需要配合高效的、便宜的印刷邮递系统,以保证其及时性。定期与累进的刊号,内容的时新性,逼迫着读者对“新”与“变”的关注,不由地将读者拉入新闻纸内容编织的新闻流中。更深层次的是在思维层面,与现代新闻纸相适应的是一种精确的时间观念。新闻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对于切身、即时、不断更新的现实资讯的关怀^{[18](P30)}。单就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新闻纸这种新式的传播工具给人带来的现代性体验与改变的思维模式与传统意义体验与思维方式的迥然有别。

对此,1872年4月30日《申报》的创刊声明更是一语道破新闻纸所营造的这种现代时间感:“盖古书之事,昔日之事,而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也。”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也有同感:“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19](P95)}报刊编织的时事之网将国人从“古书”撰述的“昔日时间”拉入报刊叙述的“今日时间”,从“治乱往复”的历史循环观拉进“日进无疆”的历史演进论。

当社会面临危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习惯于从经史子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这种思维惯习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浸染与心性规训导致的,但这也不能全然归咎于读书人的偏狭,而是诚如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所考证的,中国古典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知识体系,“到1750年中国出版的书籍的总数,比到这一年为止世界上除中文之外所印刷的书籍的总数还要多。关于人和社会真理的记述在经书中,解决问题的先例则积蓄在史书中”^{[20](P18)}。但在晚清变局中,从洋务运动开始,类似通商口岸和出使大臣这类较早接触“新世界”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依靠中国传统的知识资源已经无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寻找西学,报刊上越来越多地呈现西学知识,此时的新闻纸像是一份“知识纸”。

与西方新闻现代性迥异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有古代报纸的存在，并有漫长的报纸发行经验，但是中国新闻现代性并不是从古典性而来，中国传统的邸报没有孕育出现代报纸。当以西方新闻纸为代表的新闻式传播媒介与晚清社会相遇时，“舶来品”的在地改造，使中国新闻现代性在发生阶段呈现出许多不同于西方而属于其自身的独特面向。

同是 19 世纪，1800 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蜜蜂报》的编辑曾直言不讳地总结了当时该报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这里讲述各种新闻，爱情和争吵，和平与战争，健康与疾病，死亡与生命，失去与获得，饥饿与储藏，海上的风暴，沿海的旅行，空中的神迹与凶兆，火灾，饥荒，扫帚星，命运的转机，国家的兴衰，挚爱的失去，伟业的成就，旧有的苛政，新增的税收，不都是真的，不全是假的^{[21](P138)}。

一幅世俗生活的画卷跃然于之上，与西方新闻纸呈现的世俗生活不同，中国新闻纸所编织的新闻时事之网向来缺乏世俗生活的画面，从早期传教士报刊以科技、宗教内容为主，到同光之际口岸知识分子以报刊为媒介发起的清议之风，即使当时影响力最广、最为重视新闻、有外商背景的《申报》，其内容也不像西方报纸那样完全世俗琐碎，况且社会对其评价并不入流。而新闻纸的作用在社会上尤其在士大夫阶层中真正被唤醒，则要到清季的政治改革与社会运动中。甲午至戊戌年间，经由康、梁等维新士人的实践与传播，新闻知识在中国得以真正扩散，新式传播工具愈益呈现政治化的倾向，士大夫的政治情怀有了释放与发挥的途径，儒家的治世精神终于有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阐发媒介，他们的舆论影响也超越了传统的清议范畴。

综上所述，现代意义的“新闻”进入中国有历史的机缘，其现代性的真正形成源于 19 世纪末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新闻纸被赋予了“通上下、通中外”、“资政建言”的责任。这种新式媒介所营造的持续不断的时间流与信息流，使读书人关注现实成为可能。当然，中国新闻现代性的特殊性这种提法本身就存有疑问，即便报章是新事物，但在实际作用发挥时，在清季也往往落入“旧瓶”之中^{[13](P33)}，但从新闻纸的形式与其对时事的关注所建构起的现代时间框架角度看，它对国人“现代性”的认识与“时间观”的重塑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四、中国新闻现代性的发生——从读书人的阅报层面说起

千百年来，阅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不仅与学识、道德相关，与功名相关，更与士所志之“道”相关。读书超越了技术与技能型学习，以“君子务本”为追求，体现出“君子不器”的基本精神。这种认识取向横亘古今，直至晚清变局。随着旨在强兵、富国的洋务运动的开展，社会经世思想的兴起，读书人从以前所读尽述“道”之书，扩展到日益专业化与实用化的“知识”之书。此种转变王国维评价道：“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22](P212)}从“道出于一”到“道出于二”，读“书”的转变带来的是经典的逐渐淡出^①，留下的意义世界亟需新的内容来填补，其中报刊便是“补位”手段之一。

前文所述，与西方报刊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工商阶层与市民阶层是其主要阅读对象不同，中国报刊自其诞生之日起，其主流读者群体就是读书人，为迎合“士子文人”的阅读喜好，无论西人还是国人所办的报刊都具有浓厚的“中式”面貌。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清廷在平定太平天国内乱，收拾好两次鸦片战争残局，迎来短暂的“同治

^① 真正导致经典失位的应该是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制度与社会阶层生产密切相关，当士阶层不在产生，阅读经典的功利性目的就不存在了。经典所蕴含的“学统”、“政统”、“道统”的三重意义也逐渐沦为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知识”了。

中兴”局面,社会的文化思想生活又回到稳定不变的“传统”里。此时,流行的报纸基本上还是以“原始面貌”^{[23](P78)}行诸于世,而时至甲午,局势大变,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变法求强成为士人共同的诉求,当梁启超们开始使用报刊媒介进行政治改革,并把他们的学识、政见和精彩的文风融入报刊采编中去的时候,报人开始受人尊重,新闻纸迎来新的使命与任务。

这里笔者选取晚清士人孙宝瑄的日记为研究案例,以他们在甲午前后关于日常阅读入手,考察晚清士人意义世界的变化与报刊媒介的关系。

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初二日孙宝瑄写下了人生的第一则日记:

晨阴,日中晴。昼晷短极,倏忽已昏暮。晏起,读《左传》。晡,阅《明纪》。夕,读谢希逸《月赋》,观郭景纯《游仙诗》、左太冲《招隐诗》及谢康乐诸纪游诗。^{[24](P1)}

在尔后的半年时间里,他不厌其烦地记述下每天阅读、交友、起居的生活状态,直至1894年内5月,日记在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间中断了。由于战争的到来,平静的书斋生活被外在的纷扰打乱。在甲午战争前的时间里,阅读邸报是他意增加对外部世界见识的重要来源。从他1893年写的第一则日记始,至甲午战争前他停辍的日记止,他的文字中共有5段关于阅读邸报的记录:

十二月十七日 始闻许星翁之没于前月廿九夜,今已半月馀矣。因命仆持邸报观之,恤典甚隆重,两子长赐郎中,次赏举人。

十二月二十六日 少息,阅昨来邸报,周福清已定案斩监侯。

1894年正月初三 席间,阅邸报:元旦庆赏,凡军机、内廷、六部尚书侍郎以下,有赏紫缰者、宫保衔者、双眼翎者、黄马褂者、交部议叙者,各有差等,不可胜数。

正月十五日 阅邸报,孙京兆果以屡被参劾,开缺另补候简用,顺天府尹着陈彝补授。

正月二十三日 暮归,灯下览邸报。日来朝廷殊有振厉气象,屡读上谕,语皆严峻可畏^{[24](P15,19,24,33,37)}。

这些内容涉及官员的任免、皇家的仪典、朝廷的谕旨与政策。出生于官宦世家的孙宝瑄,在京城交友颇广,因此他对其友朋在官场的动向尤为关注。

孙的日记在1895年、1896年有缺失,到了1897年,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他与《时务报》、《苏报》有颇多接触:“至《时务报》馆,见吴铁桥”^{[24](P82)}，“诣《时务报》馆,见枚叔及仲华”^{[24](P85)}，“映时,诣《苏报》馆,购得李傅相马关受伤后映像二纸”^{[24](P97)}。这说明孙不仅在这段时间有阅读《时务报》、《苏报》等新式报刊,而且和《时务报》报馆人员建立了不错的私交。其实,不单是《时务报》、《苏报》,孙实际上还参与了不少报刊的创办。至于孙宝瑄究竟在戊戌前后阅读了多少种报刊,很难从中做出准确的判断,日记中数次以“览诸报”、“观诸报”、“读数日报纸”而带过,从出现的报刊名称统计来看,不下30余种。在以后的日记中(1907至1908年),几乎均是以“观报”、“阅报”二字记录阅报所获取的信息与知识。

广泛接触新式报刊,启蒙了孙宝瑄的新闻知识,也影响到他对这一新式传播媒介的评价。比如他认为《知新报》“粤东所出,论笔固佳,选译亦精,尤胜《时务报》。”，“览《湘报》,粗浅而有用。诣时务报馆,见《农学报》,有图说,皆译西国要法。报馆大兴,或者民智渐开乎?”^{[24](P110-111)}

孙宝瑄的阅报兴趣主要集中在对外事务和新知上,他习惯在日记中记录所阅报纸刊载的新闻,远至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习俗,近至国内的社会要闻。对于经常阅报的他来说,报纸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报纸之娱人,几如以全球为大舞台,而日日观其演变。”阅报十余年,孙积累了其对报纸的认识,他在1906年九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观报纸为今日一种大学问,无论何人皆当寓目,苟朋友相聚,语新闻而不知,引为大耻。不读报者,如面墙,如坐井,又如木偶,如顽石,不能与社会人相接应也。报所载事,虽不尽可据,然必有可据者存焉。久之,必能辨

别。设竟置而不观，则并可据者亦不知矣”^{[24](P981)}。

从甲午前阅读范围不外乎《左传》、《明纪》、《明史》、《汉书》一类的经史子集外加一些邸报信息到甲午后大量增加的新式报刊，以孙宝瑄为代表的上层士子文人的阅读内容发生了重大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其意义世界的转向。从对报刊“琐闻屑谈”、“消遣谈资”的认识“到‘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若阅报’^{[25](P24)}，报刊与国家时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当1894年那场战争的来临，由报刊所编织的时事之网从沿海到内地，进入读书人的阅读视野，可视为报刊与读书人关系的转折。“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26](P10)}此时在郑观应的笔下，阅报与读书具有了相似的意义，甚至有了同等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给士人带来的体验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快了“经典的淡出”，新闻逐渐嵌入读书人的日常生活，由此引发意义体验上时间感受的变化。

五、中国新闻现代性的发生——基于“现代时间”的理论视角

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理性化，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使人从给予世界神圣秩序和意义的原始价值理性中走出，进入一个自我创造的意义世界。新闻对当下共同世界的描绘，让人们摆脱了对“古代时间”的依恋，促进了人们从前人世界的撤离^{[27](P110)}，迅速进入一个求“新”、求“变”的世界中。

首先看求“新”。“modernism”一词今译作“现代主义”，那时译为“从新主义”，就极具象征意义。“新的崇拜”^{[28](P37)}的形成从思想史上考察，恐怕对国人影响最深的就数进化论了，进化论本身具有的尊新斥旧、厚今薄古倾向，被士人普遍接受，并逐渐衍生为“发展主义”，它不但要求社会求变趋新，而且要立于西方“新”的最前沿，行迅速“进化”之道，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尤其甲午战败之后，普遍的社会怨恨转化为希冀国家迅速变法图强的动力，一时间报刊成为社会“显学”，立于“新”的前沿，进入清廷高官的视野，屡在培养“识时务”人才的治国方略中被提及。我们从甲午后部分新创报刊的名称上便可看出这种“新的崇拜”之于报刊的影响，如：《时务报》（上海，1896）、《知新报》（澳门，1897）、《湘学新报》（长沙，1897）、《经世报》（杭州，1897）、《新学报》（上海，1897）、《新民丛报》（横滨，1901）等。同时，受进化论的影响，报刊新闻事业这种新生事物之于国家进化发达之间的关系，愈益引起重视，如1902年梁启超言：“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坠落，其工作不可不专属诸报馆”^{[29](P47)}。

其次，“新的新闻事业”与读书人“新的‘自我实现’”之间实现了接榫。传统时代，读书人的命运经由完整精密的科举制度，形成了两种安排——“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但无论进退，受儒家意识形态浸染读书人基本上都保有“天下士”的胸怀^{[28](P168)}。在朝为士，在野为绅，辅佐帝王，亦或教化乡野，读书人都可以找到“自我实现”的途径。而过渡时代的新旧变革，尤其是科举的改革与尔后的废除使读书人传统的“自我实现”遭遇极大的危机：一方面旧学问无法解决国家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读书人的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时勃兴的报刊正好成为读书人“济世”精神的理想寄寓之所。

再来看求“变”。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对“新”的崇拜与对“变”的追求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新”要求前沿，相应的对“变”要求迅速，甚至激进。最为关键的变化在于，源于时势之变，报刊媒介为士人“思变”之心、“变法”之意的表达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与以往时事议论的“私人性”“小众性”和“滞后性”相比，甲午至戊戌形成的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公开发表政治见解成为报刊文论的主流，报刊将具有政治议论色彩的文字即时地呈现出来，它打破了传统社会中

信息传播的渠道,逾越了传统政治表达封闭的纵向结构^①,在士阶层形成持续广泛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认识到现代时间的特征——对快速动的关注是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之一,由此联想,新闻概念本身对时效性的要求,晚清报刊对“时务”的追求,读者对“新闻纸的渴望”,就与近代思想中“新的崇拜”,知识分子对“少年”、“青春”的礼赞等一样拥有了相似现代的意义。

凯瑞认为,报纸与其他媒体扮演的角色是“建构与维系一个井然有序而又意义无穷的文化世界”^{[3](P8)},新闻是作为现代文化形式的显现,在由现代文化造就的意义世界中,人类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米德认为,“现(近)代文化的世界观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动态的世界观——是一种为由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变迁和事物的进化过程组成的实在留有余地,同时确实强调这种实在的世界观;相反,古代文化的世界观从本质上看则是一种静态的世界观——是一种根本不承认任何一种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变迁或者宇宙进化过程会发生的世界观”^{[30](P326)}。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作为知识类型与文化形式的新闻,它是在一定场域中生产出来的,它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必然打上不同时代鲜明的社会文化思想的烙印。建立在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上的现代新闻事业,在西方,这种“发明”烙印着鲜明的18世纪中产阶级的气质。而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它的气质以及由它带给国人意义世界的改变肯定也不同于西方。从整体角度看,主体“人”的现代性转变是和社会整体性变迁相关的,而新闻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参与了这场变化。

报刊,更准确地说报刊上的“新闻”促成媒介时间的转向,借由大众传播持续广泛的影响力不断冲击国人时空观念。有学者在考察报刊对晚清以降中国“公共空间”的作用时认识到报刊对士人从“家国天下”到“世界万国”的国家想象中提供了莫大的动力,这是空间层面;在时间层面,报刊通过对“新”与“变”的媒介呈现,便宜地把国人拉进现代时间范畴——迅速地告别过去,无限地奔向未来。报刊在过渡时代部分承担了国人意义世界“去经典化”后补位工作,又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百姓的人生日用,种种造成了社会的时间意识的转轨,促进了国人心性结构的变化——“走进现代”。尔后在经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过程中,中国的现代性体现出不同的面向和特征,而现代意义的新闻始终与中国的现代性变迁相依相伴。

参考文献

- [1] 卞冬磊. 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读报纸与现代性(1894—1911)[D]. 上海:复旦大学,2013.
- [2] 王亦高. 新闻与现代性:从“永恒”到“流变”的世界观转向[J]. 国际新闻界,2010,(10)
- [3] [美]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法]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现代生活的画家》[M]. 郭宏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卢迎伏. “现代性”视阈中的时间之维[J]. 云南社会科学,2009,(6).
- [8]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9] 王韬. 漫游随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0] 皮锡瑞. 师伏堂日记(第1卷)[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
- [11] 王棫. 严复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① 报刊文论对于清廷上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庚子事变之后清廷思变,要求廷臣疆吏进言献策,取报刊言论入奏者不在少数,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举行的新政之上谕有“自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今之言者,率出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浅见。更相是亦更相非,常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胥归于窒碍难行”之语。参考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7页。

- [12] 尤西林. 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章清. 清季民国的时期的“思想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14] 涂凌波. 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兴起[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 [15] 花之安. 新闻纸论[A]. 李天纲编校. 万国公报文选[C].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 [16] 梁启超.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A]. 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17] 陈炽. 报馆[A]. 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18] 李仁渊. 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M]. 台北: 稻乡出版社, 2013.
- [19] 黄遵宪. 走向世界丛书·日本杂事诗广注[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20] [日] 佐藤慎一.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M]. 刘岳山,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21] 转引[美] 米切尔·斯蒂芬斯. 新闻的历史[M]. 陈继静,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22] 王国维. 王国维全集(第14卷)[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 [23] 林语堂. 中国新闻舆论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4] 中华书局编辑部. 孙宝瑄日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25] 李端棻. 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A]. 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26] 郑观应. 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A]. 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27] 卞冬磊. “社会世界”的更新: 新闻与现代性的发生[J]. 国际新闻界, 2014, (2).
- [28] 罗志田. 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20] 梁启超. 敬告我同业诸君[A]. 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30] [美] 乔治·赫伯特·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M]. 霍桂桓,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Formation of Time with Modern Sense and Occurrence of Modernity of the News in China

ZHOU Tong, RUI Bi-feng

Abstract: Time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human meaning of the world. Modernity begins with modern time concept.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occurrence of the news with modern sense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i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ime with modern sense, and finds out that the news, as a genre of modern culture, i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origin of modernity in China. By strengthening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time with modern sense, the news constructs a medium prospect of persuing innovation and change, partly implements the complementary work of the spiritual world after the fading of classic, and promotes the change of the Chines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moving towards modernity”. In this sense, the news is available to be a reliable reference to study the modernity in China.

Key words: modernity; time with modern sense; modernity of news

(责任编辑 刘传红)